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說一集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國新文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三集

1935/10

小 說 一 集

茅 盾 編 選



海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851564

一九三五，二，十日付排

一九三五，五，十五初版

1-----2000

導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No. 353

元十二洋大售部大十書全

號七三四一第字審證查審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會員委傳宣央中

導

言

導言

茅盾

一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文學革命論的時候，還沒有「新文學」的創作小說出現。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出現的時候，也還沒有第二個同樣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樣成功的第二篇創作小說。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月，新潮雜誌發刊以後，小說創作的「嘗試者」漸漸多了，然而亦不過汪敬熙等三數人，也還沒有說得上成功的作品；然而「創作」的空氣是漸漸濃厚了。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一月，小說月報也革新了，特設「創作」一欄，「以俟佳篇」；然而那時候作者不過十數人，小說月報（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創作，連散文在內，多亦不過六七篇，少則僅得三四篇。而且那時候常有作品發表的作家亦不過冰心，葉紹鈞，落華生，王統照等五六人。

那時候，（民國十年春），小說月報每月收到的創作小說投稿，——想在「新文學」的小說部門「嘗試」的青年們的作品，至多不過十來篇，而且大多數很幼稚，不能發表。

然而年青的「嘗試者」在一天一天加多，却是可以斷言的！

那時候，除小說月報以外，各雜誌及各日報副刊上發表的創作小說，似乎也不很多。據民國十年四月小說

月報所載的不完全的統計，（郎損，春季創作壇漫評，小說月報十二卷四號），那年的一月到三月，發表了的創作短篇小說約計七十篇；其中有不少恐怕只能算是「散文」。到了那年的七月，小說月報又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郎損，評四五六月的創作，小說月報十二卷八號），則四月到六月的期間，短篇小說的創作已有一百二十多篇，比春季增加了一倍光景。這一點不完全的統計，就證明了那時候「創作」在一天一天熱鬧起來。

自然，那時候發表了的創作小說有些是比現在各刊物編輯部積存的廢稿還要幼稚得多呢，然而在那時候有那麼些作品發表，已經很難得。現在我們這「文壇」，比起十多年前，可以說是「進步」得多了罷？現在我們差不多每一個月看得見有希望的新作家出現，現在我們所見一個月裏的在水平線以上的作品有從前一年的總數那麼多；我們覺得現在這點兒「成績」還是貧弱，我們要求更多的表現生活各方面的作品，我們要求「偉大的作品」，然而回顧十多年前的「文壇」，我們不能不承認十多年來我們這「文壇」是有了進步的。

而這進步的過程是很長很長一條路。從「新文學」發展的歷史上看，這條「路」的起點，——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跡，是值得保留，研究，而且來一次十年的總結。

二

民國六七年的時候，好像還沒有純然文藝性質的社團。那時的新青年雜誌自然是鼓吹「新文學」的大本營，然而從全體上看來，新青年到底是一個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數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場發表他們對於文學的議論。他們的文學理論的出發點是「新舊思想的衝突」，他們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覺上去攻擊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舊文藝。

這是「五四」文學運動初期的一個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條正確的路徑。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文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於北京。這是最早的一個純文藝的社團，然而這一個團體發起的宗旨也和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

運動初期的文學團體的創立很不相同。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並不是因為有了一定的文學理論要宣傳鼓吹。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宣言中說「有三種意思，要請大家注意」：

第一，是「聯絡感情」。「中國向來有文人相輕的風氣，因此現在不但新舊兩派不能協和，便是治新文學的人裏面，也恐因了國別派別的主張，難免將來不生育界限。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大家時常聚會交換意見，可以互相理解，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

第二，是「增進智識」。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也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一生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所以我們發起本會，希望不但成為普通的一個文學會，還是著作同業的聯合的基本，謀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這雖然是將來的事，但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希望。」

這個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發表的時候，有十二個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在這一個宣言裏，只有第三項略略表明了文學研究會對於文學的態度，這態度在今日看來，自然覺得平淡了，但在那時候這正是新文學運動的綱要之一，並且和那時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態度相應和。

「五四」時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後應當建設怎樣一種新的文化呢？這問題在當時並沒有確定的回答。不是沒有人試作回答，而是沒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擁護。那時候，參加「反封建」運動的人們並不是屬於同一的社會階層，因而到了問題是「將來如何」的時候，意見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沒有比較最有勢力的一種意見，這就是所謂「只問病源，不開藥方」。這是對於「將來如何」一問題的一種態度，——或者也可以說是躲避正面答覆的一種態度。這不是答案。然而這樣的態度的產生有牠社會

的根據，這是代表了最大多數的比不上而比下有餘的智識者的意識的。同時這種意識當然也會反映到文藝的領域。文學研究會宣言中所表示的對於文學的態度就是當時普遍現象的一角。

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自始即不會提出集團的主張，後來也永遠不會有過。牠不像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一些具有確定的綱領的文學會，牠實在正像牠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個「著作同業公會」。

因為只是「著作同業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的簡章第九條雖有「本會會址設於北京，其京外各地有會員五人以上者，得設一分會」之規定，而且事實上後來也有幾個分會，而且分會也發刊了機關報，然而這決不是「包辦」或「壟斷」文壇，像當時有些人所想像。

同時也因為只是「著作同業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從來不會有過對於某種文學理論的團體的行動，而且文學研究會對於牠的會員也從來不加以團體的約束；會員個人發表過許多不同的對於文學的意見，然而「團體」只說過一句話，就是宣言裏的「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

這一句話，不妨說是文學研究會集團名下有關係的人們的共通的基本的態度。這一個態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這個態度，在冰心，蘆隱，王統照，葉紹鈞，落華生，以及其他許多被目為文學研究會派的作家的作品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

三

現在我們回顧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這五年的期間，（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總會覺得那時的創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發表的機關也寥寥可數。然而我們再看看那時期的後半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從民國十一年起（一九二

(二)，一個普遍的全國的文學的活動開始來到！

因為材料的缺乏，我們現在還不能夠把那時候亘全國的新文藝的活動繪一幅比較詳備的「鳥瞰圖」；可是我們僅僅從那時候小說月報（十四卷到十六卷）的國內文壇消息欄的記載，已經可見當時的盛況。

這一時期，是青年的文學團體和小型的文藝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時代。從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到十四年（一九二五），先後成立的文學團體及刊物，不下一百餘——

在北京，有聯社，（民國十一年），發刊了不定期刊燭火；有淺草社，（民國十二年春），出版淺草季刊；有春光社，（民國十二年春）；有星星文學社，出版文學週報（十二年八月）；有嬰孩社，（十二年十月），出版了二月刊嬰孩的，和星花半月刊，（均在十三年春）；有鸞翼社（平民大學學生的組織，十二年冬），定期刊鸞翼；有雪花社及雪花不定期刊（十三年十月）；有以「研究現實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藝的墮落」的勞動文藝研究會，（十三年九月），出版火球旬刊；有北京大學學生及上海南方大學學生共同組織的八月文學社（十三年八月）；有薔薇社（約在十二年）；有疏星半月刊，（十四年六月）；微波旬刊（時間同上）；有中法大學西山學院學生組織的西山文社（十四年一月）；而上舉之淺草社除已出版淺草季刊及文藝旬刊外，在十四年春又改出了沉鐘週刊。

在天津以及河北省其他各地，有綠波社（十二年五月，天津），先出了不定期刊詩壇，隨後（同年八月）又出版了綠波旬刊和小說兩種；有第六師範（冀縣）的文學研究會，出版微笑週刊（十二年十一月）；有南開學校（天津）的文學會，出版文學半月刊（十三年五月）；又陝西榆林中學學生（？）所辦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也都附在天津民意報，作為副刊之一種。

在江蘇省，有南京的玫瑰社（十二年春），季刊心潮，（由上海民智書局發行）；無名作家社（南京第四師範，十二年秋）；詩學研究社（東南大學學生，十三年十一月），出版了詩學半月刊；又有南通的文藝共進

社（十二年春），刊物名嫩芽（同年四月）；月潮社（南通代用師範附小，十三年秋），出版月潮半月刊；有蘇州的曉光社（十一年十月，第一師範），季刊曉光及半月刊酸果；松江的彌酒社（十二年春），出版有彌酒月刊；文藝社出版了文刊（十三年八月）。此外在無錫有湖波社（十二年），曾刊行湖波雜誌；在揚州有第五師範學生組織的梅花社，出版了冰花（十二年十一月），及文藝（第五師範學藝部與梅花社的聯合刊物，十三年三月）；在徐州有春社（徐東中學，十三年春），出版了春的花。

至於上海呢，除了文學研究會上海分會的文學旬刊（先附在時事新報內，後改週刊，獨立發行），創造社先後辦過創造季刊，創造週報，及創造日。十三年初田漢個人辦了南國社，發刊了南國（半月刊）。這是大家比較知道的。此外，尚有北京淺草社的上海社員辦過文藝旬刊，（十二年八月，附上海民國日報發行）；神州文學社出版過文學季刊（十二年九月）；東風社（十三年春）出版過東風季刊；青鳳文學社及湖波文藝社（都是上海大學學生的組織，十三年春）；愛美文藝社（國立自治學院學生組織，十三年七月）；濟美社的濟美（十三年四月）；飛鳥社的飛鳥月刊等等。

浙江方面，寧波最爲熱鬧；十一年秋就有了春風週報社的春風週報，內分青年與兒童兩部，後來有文學週刊（附四明日報內，十三年秋），有日月文學社的日月旬刊（時間同上），有第四中學學生組織的曦社（時間同上）；有春風學社（十三年七月），飛蛾社（亦爲四中學生組織），有定期刊飛蛾（十三年五月）。在杭州有片月詩社（十三年六月），悟社（之江大學學生組織，以提倡革命文學爲宗旨，十三年四月），以及赤社之不定期刊赤報。在嘉興有秀州文學會（秀州中學）的定期刊碧濤（十二年六月），在台州有第六中學知社的半月刊「知」（十三年七月），在紹興有愛美文藝社的月刊愛美（十三年九月），又有第五中學師範部的半月刊微光（十四年秋）。

在廣東，廣州有文學研究會分會及刊物文學旬刊，（十二年八月）；潮汕方面有火焰文學社的週刊火焰，

(十二年八月)有晨光文學社(潮州，金山中學，十二年九月)，其後(十三年十一月)火焰文學社又有刊物心聲；在海豐有螢光社(十三年春)；在汕頭又有彩虹文學社的彩虹週刊(十二年十一月)；潮州有伏虎學社(亦在金山中學)，定期刊爲谷風(十四年一月)。

在湖南，長沙是中心，團體及出版物有微光(十二年九月)，嶽雲文藝社的文藝(十二年)，鷄鳴社(長沙一中)的鷄鳴(十三年七月)，湖光文學社的湖光(十三年春)，晨曦週報(湖南旅鄂中學學生的刊物，附長沙的湘報發行，十三年三月)，旭光社的旭光半月刊(十三年二月)，晨社的晨光(十三年二月)，教會學校學生所辦的麥華(十三年二月)半月刊，還有嶽雲中學文學研究會編輯而附在天津民意報出版的卿雲(十四年末)，心花社(華中美術學校)的不定期刊心花(十四年五月)，長沙綠波社社員的瀟湘綠波(十四年一月)，櫻寧學會的櫻寧(十四年二月)。此外只有湘潭有一個綠野社，出版了綠野(十三年十二月)。

四川最早的文學團體好像是草堂文學研究會，(成都，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至四期後便停頓了，次年一月又出版了草堂的後身浣花。又有定期刊小露(十二年)似非全人雜誌。成都以外，瀘縣(川南師範)有星星文藝社，定期刊爲星星(十三年)，又有零星社的零星(十二年)；重慶有南鴻週刊(十四年二月)。雲南當十二年四月間就有週刊翠湖之友。其後又有雲波社的雲波旬刊(昆明，十三年五月)，聯合中學學生辦的孤星週刊(十三年五月)，「中學生辦的演潮(非純文藝)」，以及好像是教員們辦的心華(十三年一月，成德中學)。又有澎湃，(十三年)好像也不是青年學生作的主體。

河南及湖北兩省，似乎差些；十三年八月有中州文藝出世，但好像是旅外的河南人所辦，編輯在天津。此外，中州大學的文藝研究會有文藝(十四年九月)，開封二中的微實學社有荊野(十四年尾)，臨潁的飛霞文藝社有飛霞(十四年三月)。湖北是武昌作爲中心，有星野社的星野(江聲日報副刊，十三年九月)，靚聲文藝社的小型月刊(僅一單張)靚聲(十四年四月)，以及武昌大學藝林社的藝林旬刊(十四年一月)。

此外，在東北有很早成立的白楊社（吉林，十二年九月成立，穆木天等三人主持，以「發表文藝的創作，促進吉林新文壇」為宗旨），到了次年二月刊物白楊文壇出世，由天津新民意報附送。同時奉天方面亦成立了東光社，以「研究國故，提倡東三省新文學」為宗旨，出版了東光週刊，繼續至廿一期。東光社的基本似在新民的文會中學。十三年五月，吉圖縣又有綠意詩社，有定期刊綠意。又有啓明社之啓明，（十三年四月，新民意報副刊）。奉天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辦了半文藝的奉天學生。（十三年四月）。在江西省，有樂平星社的洎聲（十三年），南昌心弦社的心弦（十三年），又有非賣品的吶喊（南昌，十四年五月）。在安徽黟縣，有芙蓉社的定期刊芙蓉（十二年三月）。在山西有國立山西大學曙社的半月刊醒繡（十四年一月），太原有紅光文學社的紅光。又在青島，出版過青痕。

上面這些材料，根據了小說月報各期的國內文壇消息，而當時小說月報則只據收到的刊物或通訊，未嘗有意地去搜集，因此實際上從民國十一年到十五年這時期內全國各地新生的文學團體和刊物也許還要多上一倍。然而即就此不完全的材料看來，已經見得當時整個中國到處有新文學活動的踪跡。

這一大活動的主體是青年學生以及職業界的青年知識份子。他們的團體和刊物也許產生了以後旋又消滅，（據星海上册的附錄，則在民國十三年上半年全國的文藝刊物尚有週刊十五種，旬刊十種，半月刊二種，月刊三種，季刊十種，不定期刊十三種，共五十三種，自然這統計也不完全，只據了星海編者所見到的而已），然而他們對於新文學發展的意義却是很大的。這幾年的騷亂而且好像有點浪費的團體活動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泛濫，跟著來的是大羣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在那狂猛的文學大活動的洪水中已經練得一付好身手，他們的出現使得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頓然有聲有色！

四

民國十年八月的小說月報有一篇文章分析那時候大多數的創作小說反映了怎樣的社會生活。（小說月報十二卷八號，郎損的評四五六月的創作）。自然，這篇文章所根據的材料只是那一年的四五六三個月，而且在此三個月的範圍內也一定有不少作品未爲郎損所及見；然而這篇文章發表的時期恰恰正當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與後半期的交點，所以我們不妨把牠的分析，作爲前半期的研究的基礎，從而更與後半期的創作比較一下。

這一篇文章根據了那時候三個月中間已發表的小說一百二十餘篇來研究牠們的題材，思想，與技術。作者所用的方法是「類別這三個月裏的創作，顯出牠們各所描寫的社會背景的一角，然後再考察同屬於一類的創作有什麼共同色彩與中心思想，描寫的技術可有幾個不同的格式」。於是第一，他告訴了我們的，是一百二十幾篇小說在題材的分野上——

屬於男女戀愛關係的，最多，共得七十餘篇；

農村生活的，只有八篇；

城市勞動者生活的，更少了，只得三篇；

家庭生活的，也不過九篇；

學校生活的，五篇；

一般社會生活的，（小市民生活），約計二十篇。

但是，寫到一般社會生活的二十篇，實際上大多數還是把戀愛作爲中心，而「描寫家庭生活的九篇，實在仍是描寫了男女關係」——戀愛，所以「竟可說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佔了全數百分之九十八」了。因而作者的結論是：大多數創作家對於農村和城市勞動者的生活很疏遠，對於全般的社會現象不注意，他們最感興趣還是戀愛，而且個人主義的享樂的傾向也很顯然。

那麼，佔了總數百分之九十八的戀愛小說寫得怎樣呢？

作者告訴我們：那時候最多的戀愛小說不是寫婚姻不自由，便是寫沒有辦法解決的多角戀愛。然而兩者有一個共同的毛病，——觀念化。「人物都是一個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個樣的，舉動是一個樣的，到何種地步說何等話，也是一個樣的」。這些戀愛小說內的主角大抵不是作家自己就是他的最熟悉的伴侶，可是一搬上紙面尚不免觀念化，無怪那極少數的描寫農村生活和城市勞動者生活的作品更其觀念化得厲害！

郎損這批評，也許是太苛刻了一點。我們知道第一個「十年」前半期的創作很有一些是在他的批評的例外的。就拿那些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作品來看罷，落華生的幾篇（命命鳥，十二卷一號，商人婦，十二卷四號，換巢鸞鳳，十二卷五號），都是穿了戀愛的外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冰心女士和葉紹鈞的作品企圖解答人生是什麼。不過郎損的批評在指出那時候創作方面最普遍的現象這一點上，是值得注意的。他這不完全的「考察」至少已經觸到了那時候（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創作界的兩個很重大的缺點了。這兩個缺點，第一是幾乎看不到全般的社會現象而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觀念化。

這兩個缺點，當時有許多人的注意。怎樣克服這些缺點呢？許多人的見解並不一樣。從當時的青年羣內（包括了青年的作者和讀者）發出來的最普遍的呼聲只是很乾脆的一句話：讓牠自由發展就好了！（小說月報十三卷各期的通訊欄內就記錄著一部分這樣的現象）。但是空空洞洞一句「讓牠自由發展」顯然不是當時實際所需要。十二卷七號的小說月報有特別的一欄——「創作討論」，企圖把這問題更具體的研究一下。參加這討論的，共有九位，在現今看來，其中有一位署名說難的我對於創作家的希望最爲切實了。（這位說難，記起來好像就是胡愈之）。他這篇文章指出了作家們除「感情的鍛鍊修正和藝術力的涵養之外，實際社會是不能不投身考察的。文學（廣義）中之文法語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舊來之語體小說，是不能不參考的。新聞紙第三面的紀事，是不能不多看的。而且街談巷議和許多外行人的議論，也是不能不虛心聽受的。」可是當時青年的

創作家或有志於創作的青年却不耐煩下那樣的水磨工夫，當時一般的風氣是靈感一動振筆直書，而且認為既是靈感的產物就一定不會不好。

當時評壇方面沒有繼續不斷地指出這種刻苦的「水磨工夫」的必要，自然也是個很大的錯誤。然而創作界的貧弱單調在當時也還有原因。在客觀上，當時一則西洋文學名著被翻譯介紹過來的，少到幾乎等于零，因而所謂「學習技巧」云者，除了能讀原文，就簡直談不到；二則，普遍於全國的新文學大活動還沒起來，廣大的青年羣衆內的文藝才能尚未覺醒。在主觀上，當時的青年作家大多數是生活單調的學生，生活以及由生活產生的他們的意識，一方面既限制了他們的題材，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們的覓取題材的眼光。第一個「十年」前半期的創作界之所以寂寞而單調，不外是這一些原因。

倘使我們將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當作一條界線，那麼，即使在小說月報的範圍內，我們也就看見了那「界線」之後（民國十一年，小說月報十三卷），已經有些新的東西。

我們看見了描寫學徒生活的三天勞工底自述（利民，小說月報十三卷六號），我們又看見了描寫年青而好勝的農村木匠阿貴的悲哀的鄉心（潘訓，小說月報十三卷七號），我們又看見了很細膩地表現了賣兒女的貧農在骨肉之愛和飢餓的威脅兩者之間掙扎的心理的偏枯（王思玷，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一號），我們又看見了巧妙地暴露世俗所謂「孝道」的虛偽的兩孝子（朴園，見同上）。這幾篇，不但在題材上是新的東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擺脫了章回體舊小說的影響，牠們用活人的口語，用「再現」的手法，給我們看一頁真切的活的人生圖畫。這幾篇小說的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現就不見了，（利民和朴園各人只有一篇，王思玷寫過七八篇，最早的一篇是發表在小說月報十二卷十二號徵文欄的風雨之下，到一九二四年以後就不見他了，潘訓總共只做了九篇，都收在雨點集內，一九二五年以後也就不見他再作），他們留給我們的，很少，可是單單這少數的幾篇也就值得我們再來提起了。

許多面目不同的青年作家在兩三年中把「文壇」裝點得頗為熱鬧了。自然，這所謂「熱鬧」，比起最近五年來，（比方說，一九三零到三四年罷），是遠不及的，但比起一九二二以前的五年來，正猶最近的五年（說是新文學史上第二個「十年」的後半期罷），比那時（第一個「十年」的後半期）要熱鬧得多一般。那時有滿身泥土氣的從鄉村來的人寫著匪禍兵災的剪影，（如同徐玉諾），也有都市的流浪者聲訴他「孤雁」似的悲哀，（如同王以仁），也有渴慕「海」的自由者「瘋人」似的說教，（如同孫儂工），也有以憎惡的然而同情的心描寫了農村的原始性的醜惡，（如同許傑）。創作是在向多方面發展了。題材的範圍是擴大得多了。作家的視線從狹小的學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的波浪移轉到廣大的社會的動態。「新文學」漸漸從青年學生的書房走到十字街頭了。然而是在十字街頭徘徊。

這一時期，兩種不同的對於「人生」問題的態度，是頗顯著的。這時期以前——「五四」初期的追求「人生觀」的熱烈的氣分，一方面從感情的到理智的，從抽象的到具體的，于是向一定的「藥方」在潛行深入，另一方面則從感情的到感覺的，從抽象的到物質的，于是苦悶彷徨與要求刺激成了循環。然而前者在文學上並沒有積極的表現，只成了冷觀的虛弱的寫實主義的傾向；後者却熱狂地風魔了大多數的青年。到「五卅」的前夜為止，苦悶彷徨的空氣支配了整個文壇，即使外形上有冷觀苦笑與要求享樂和麻醉的分別，但內心是同一苦悶彷徨。走向十字街頭的當時的文壇只在十字街頭徘徊。

現在，我們回顧第一個「十年」的成果，也許會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我們的「新文學運動」的初期跟外國的有點不同？在我們這裏，好像沒有開過浪漫主義的花，也沒有結寫實主義的實；我們的初期的作品很少有反映着那時候全般的社會機構的；雖然後半期比前半期要「熱鬧」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會動態仍舊不能在文學裏找見。

這一個問題，大概要分做兩半截來看。第一，假使承認「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運動，則此一運動弄得虎